

中文版

儒教文化研究

Journal of Confucian Culture

第二輯

成均館大學校 東亞學術院

儒教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nfucian Cultural Studies

The Academy of East Asia Studies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2002 韓國

中文版

儒教文化研究

第二輯

目 次

容轩李原的政治思想及其儒家哲学的原理	池 教 宪	1
儒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并存	崔 钟 成	17
从天人关系看原始儒教中的礼与法	尹 武 学	31
祭仪：象征的宴飨	林 泰 胜	47
儒教民本思想和政治哲学研究	权 仁 浩	61
儒教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学说	辛 正 根	75
东亚和儒教文明的选择以及世界格局	金 东 泽	93
张载的大人境界和圣人境界	黄 棕 源	107
吴澄：蒙元时代的通儒	方 旭 东	129

容轩李原的政治思想及其儒家哲学的原理

— 以〈十条疏〉和〈十一条疏〉为中心 —

池 教 宪*

I、李原的生涯与时代背景

容轩李原(1368-1429)字次山，号容轩，谥号襄宪，是高丽门下侍中李岩之孙、密直副使李冈之子，在李穡门下修学的权近是其姐夫。

容轩文科及第踏上仕途之时，正是高丽王室灭亡、朝鲜王朝创立的时期，围绕朝廷和众臣发生了很多重要事件。先是在1374年9月，宦官崔万生等半夜弑杀恭愍王，接着是禑王即位。1388年5月，出面征伐辽东的右军都统使李成桂从威化岛回军开城，废了禑王，将其流放江华，拥立昌王。12月，保守势力的政治核心崔莹被杀。1389年11月昌王被废，拥立了恭让王。12月，废王父子遭到诛杀。第二年5月，李穡下狱。1392年4月，郑梦周遭击杀。7月，李成桂在德寿宫即位，易姓革命成功。1393年2月，改国号为朝鲜，1394年4月，迁都汉阳。

其后，又在1398年8月爆发了所谓戊寅靖社(又称芳硕之乱或称郑道传之乱)的王子之乱，郑道传一派和芳硕(世子)、芳蕃被杀，芳果被册封为世子。9月，李太祖让位，世子芳果继承王位。1400年，由于在戊寅靖社中立功的朴苞阴谋策划，芳干发动了叛乱，结果芳干被活捉后发配，朴苞被处刑。接着，定宗得到上王(太祖)的许可，在2月立芳远为世弟，11月把全部权力委任给他，太宗即位。¹

在这样混乱的政治旋涡中，容轩15岁(1382年)成为进士，18岁(1385年)文科及第，21岁(1388年)成为司仆寺丞，历任工曹佐郎和礼曹佐郎，

*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名誉教授

¹ 震檀学会，《韩国史》，近世前期篇，汉城，乙酉文化社，1977，pp.26-81。

然后任兵曹正郎，开始了正式的官僚生涯。后来，他在1392年(太祖1年)任司宪府持平和侍史，1396年(太祖5年)任司宪府中丞，1400年(定宗2年)任右副承旨和左承旨，1401年(太宗1年)任司宪府大司宪，1402年(太宗2年)任京畿道观察使，1403年(太宗3年)任承枢府副提学、平壤府尹，1406年(太宗6年)任艺文馆提学、大司宪、汉城府使，1408年(太宗8年)任庆尚道观察使，1409年(太宗9年)任江原道东北面巡察使，1413年(太宗13年)任永吉道东北面都巡问察理使，1415年(太宗15年)任大司宪，1416年(太宗16年)任汉城府使、议政府参赞、兵曹判书，1417年(太宗17年)任判右军都总制副事、议政府赞成，1418年(太宗18年)任吏曹判书、右议政，1421年(世宗3年)任左议政等，历任很多官职，并兼任其它职位，还在1403年(太宗3年)和1419年(世宗1年)作为谢恩使、1425年(世宗7年)作为进贺使访问了明朝。²

李原出生后四个月，父亲去世，他五岁进入权近(1352-1409)门下。权近在1369年(恭愍王18年)文科及第，踏上仕途。恭愍王一被弑杀，他就与郑梦周、郑道传等冒险主张排元亲明，1389年(昌王2年)访问了明朝，因暗中撕看明朝的礼部咨文，遭到发配，几经辗转，直到李成桂革命后，历任赞成等许多官职。权近在李穉门下与郑梦周、金九容、朴尚衷、李崇仁、郑道传等硕学交游，为振兴儒学作出了贡献。他为郑道传的《佛氏杂辨》增加过注释，留下了《阳村集》，特别是《入学图说》和《五经浅见录》是他的重要著作，前者对其后的李滉等一些学者产生了影响，后者中的〈礼记浅见录〉还曾在经筵进讲。比权近小十六岁的李原入权近门下时不过五岁，当时权近不但学问已经成熟，正开始作为血气方刚的新进官僚开展活动。权近在诗文和经学方面造诣很深，估计对李原产生了影响。当时的性理学学者们可分为拥护高丽王朝的保守派和支持新王朝的革新派，权近属于后者。³

² 李东奎译，《国译铁城联芳集》，全州，新亚出版社，1995，pp.299-306。

³ 柳承国，《韩国的儒教》，汉城，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1980，pp.177-180。

II、李原政治思想的渊源

1. 〈十条疏〉的结构

李原留下了231首诗、17篇疏、13篇启、2篇笺、5篇献议、5篇赠遗，郑麟趾写的〈容轩先生集序〉中说李陆拿来遗稿一秩，并说佚失者很多。由此看来，李原的著作相当多。本稿拟以《国译铁城联芳集》中收录的《容轩集》卷1、2、3、4为基础材料，考察他的政治思想。

要考察李原政治思想，最要紧的资料是他任司宪府持平和侍史的1392年(朝鲜太祖1年)7月20日和大司宪闵开⁴一起上的〈十条疏〉和同年9月11日与南在⁵一起上的〈十一条疏〉。除了《国译铁城联芳集》以外，这两篇疏及其它文献资料还收于《李氏绎史》(铁城文库第2集第3卷)襄宪公传内的〈国朝实录〉篇内。

受到郑道传和权近的影响，李原理所当然地成了朝鲜王朝的官僚，对官僚生活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留下的疏、启、笺、献议等都可以说是很好地表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的资料。在此，笔者想首先考察一下他担任司宪府持平时与大司宪闵开(李原之姐夫)一起上的1392年(太祖1年)的〈十条疏〉。

他在〈十条疏〉开头指出李成桂是应天革命，引《书经》周书召诰篇，“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呜呼，曷其奈何不敬”，“夫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故大而事天殫帝，微而起居食息，不可得以离也”，还说“钦崇天道，夙夜祗惧，汤王之所以兴也；灭德作威，谓敬不足行，桀纣之所以亡也”。接着，他说“考之历代，治乱兴亡，皆由此出，是则敬之一字，固人君出治之源也”。李原认为，讨伐夏朝的暴君桀、建立殷的汤王和讨伐殷朝的暴君纣、建立周的武王都是顺应天命，灭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的李成桂和他们一样，也是顺应天命掀起革命。他还阐明，为了顺应天命，不能抛弃敬，说“存心以敬，对越上帝…则此心之

⁴ 闵开(1360-1396)天性聪明，性格刚直，曾历任台谏和京畿道、忠清道观察使。参照：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1，太祖实录，太祖 卷十 五年丙子十二月，p.98以下，〈汉城尹闵开 卒〉条。

⁵ 南在(1351-1419)出入中外，有经世济民之才。为李太祖的创业有功，官至右议政，被封为宜宁府院君。参照：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2，世宗实录，世宗 卷六 元年己亥十二月，p.351上，〈宜宁府院君 南在 卒〉条。

敬，足以感天心，而兴至治矣”。他强调敬，是希望通过实行〈十条疏〉中所列的行动“以兴一代之规模，以为万世之准则”，⁶这明白地表现出儒家的天命思想和王道思想。

关于儒家的天命思想，孔子在《论语》为政篇里说“五十而知天命”，季氏篇里说“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对它极为重视。天命的意义很多，包括天意、当行之理、刚健之德、太和因蕴之气、自然、宇宙的本体等等，中庸第1章里“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指的是所禀之理，也是性善论的源头。但这里重要的是‘天命靡常’的观念，天命靡常与国命神授密切相关，因为天子即皇天上帝的元子，皇天上帝随意改换元子就是改换天子，改换天子就是革命。

李原在〈十条疏〉开头说“存心以敬 对越上帝”，强调敬的要点是君主修德、尊天命、守君位。王道思想的源头在《尚书》洪范篇的“无偏无党 王道荡荡，无党无偏 王道平平，无反无侧 王道正直”，简单而言就是让百姓过好日子。《孟子》对这种王道思想的内容和方法做了比较详细、具体的解释，《孟子》梁惠王上中指出，不违农时、不捕幼鱼、不乱砍伐小树及使人养生丧死无憾就是王道之始。

据李东奎所译《国译铁城联芳集》中的条目，简要考察一下〈十条疏〉，其内容如下：

第一，树纪纲。古代周朝尽管衰败，诸侯放恣，天下却没有轻易倾塌，就是因为有纪纲。

第二，明赏罚。赏罚公平，公道自然明，人们不敢相抗。君主的赏罚应如同天地培育、倾覆万物，如果以不存私欲的心情去对待，私心就无立足之地。

第三，近君子，远小人。君子持正言格论，不倾斜于它处，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操行和气概，只知有社稷而忘我。…君子难以接近，却容易疏远，小人容易接近而很难疏远。《书经》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君主如果知人之贤，即使有缺点也应起用，如果知人奸邪，即使他有功也应疏远。

第四，纳谏诤。《孝经》传13章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这是万世不变的格言。⁷君主的威严如雷霆，君主的权势重

⁶ 《十条疏》开头陈述的内容，参照：李东奎译《国译铁城联芳集》，pp.307-308.

⁷ 参照《孝经》传13章。这里说，不但是天子，对诸侯和大夫来说，如果有诤臣，即使无道，也能保证不失自己的国家和家庭，读书人有诤友，就能贤名不离身，父亲有诤子，就不会身陷不义。

达万钧(30万斤)，不顾雷霆万钧，进药石之言(直言)怎会是易事？所以，即时君主主动向臣下求谏诤，温颜接受谏诤，使进谏者显身扬名，士人尚且畏惧，不敢直言，更不必说如果用威严和权势压迫，直言当然不能上达，言路蔽塞，灾祸就会不意而至。《书经》说“从谏不拂”，还说“后从谏则圣”，就在讲政治上谏诤的重要性。

第五，断谗言。舜也说“朕罢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如果能以聪明映出奸邪，各种邪恶就会消失，谗言会被杜绝。

第六，戒逸欲。《书经》里说“无教逸欲有邦”，安逸和贪欲对德的损害何止一二？宫室的安适、饮食的美味、妃嫔与妾(侍女)的服侍、狩猎的快乐、家畜的肥美、对花草的玩赏等，都足以害人性，荡人情，确实不能不慎，天命无常，只助有德者。

第七，尚节俭。缩小宫室、穿着粗陋是夏朝君主禹的盛德，节约钱财、穿着俭朴服饰是汉文帝留下的佳话。高丽王朝面对小的灾变，不知畏惧、反省，只着力于奉佛奉神，浪费的财物无法一一纪录，这是君王也清楚知道的。如果朝廷做事不放纵，不奢侈，百姓看在眼里，会被这种高尚的德行所感动。

第八，退宦官。宦官为人大多很有颜色，善言谈，恭敬并服从官长。因此，君王很容易陷入他们的计谋却不觉，结果权柄旁落、引起祸乱的情况曾连续不断，令人不胜感慨。现在应该从他们当中选出忠厚、慎重者，吩咐做守门、清扫等事，不交付其他事宜。把他们当中奸邪、狡猾、贪污、不知廉耻者都遣返乡村，不让他们成为维新教化的麻烦。

第九，汰僧尼。佛教是夷狄之一法，汉朝永平年间传入中国，后传到我国，对其崇奉非常盛行，寺刹林立，着僧服者遍及全国。其本法以清净寡欲为宗，其教徒就该孤高地隐居于岩穴，蔬食饮水，修炼精神。但是，他们现在与平民混在一起，用玄妙的高谈阔论眩惑士人，有些人甚至用生死、罪和业报恐吓百姓，导致时俗放荡，不可恢复。应该把这些人聚集起来，考察他们的学行，让学精行修者完成志向，其他人则让他们蓄发，从事生业。

第十，肃宫闱。潜邸的旧姻亲如果借口姻亲关系进出，守门人也不敢追问，因此，求见君主的行为盛行，毁谤他人的话也因此流传开来，离间内外，造成刑罚和政治的混乱。应该让守门的官员恪尽职守，使一切人等无正当理由不能随意进入宫门，将那些奸诈、阿谀的小人逐出。

《十条疏》列举上述的十条，然后强调君主的至宝是信义，即国家由百姓守护，百姓由信义守护。因此，圣人宁可抛弃军士和粮食，也不

允许抛弃信义，其教育后世的意思很深。⁸ 君主的信义应该如金石盘坚固，实施其命令时，使人们如同相信四季一样信任他，对上不负皇天护佑之命，对下不负臣民拥戴之意。

在上述十条中，除了放逐宦官、淘汰僧尼两条之外，国王对其余条目都做了予以实行的批复。

2. 〈十一条疏〉的结构

1392年7月20日容轩李原和闵开一起上〈十条疏〉之后，接着在9月11日和南在一起上了〈十一条疏〉，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西北面是国境地区，所以在平壤和安州各布10翼军队，在义州布4翼军队。每1翼军队各设千户1人，负责训练军队，装备武器，无事时让他们回乡务农，有事时让他们出击。但是最近千户贪污，迫害军士，就像对待奴隶，指示他们劳作，让他们扩建农场，强抢军士们的女儿为妾，肆意妄为，军士们都逃散了，越过了国境。应该选拔有武艺又很清廉的人担任千户，让他们训练军士，整修武器，如果有如以前作弊者，就通过守令报告监司，勒令严禁。

第二，高丽末曾命令各道炼铁打造兵器，这一政策实行已久。据说，西北方面炼的铁是以前的两倍，兵器的数量却不多。现在，应该让都评议使司向都巡问使发送公文，让他们在每个季节的最后一个月提交报告，掌握一个月炼铁的数量和制造的兵器数量，报告哪些做得好该予以奖励，哪些做得不好该予以惩戒。

第三，女人如果父母双亡，无“归宁之义”。但是，在高丽末期，风俗颓败，士大夫的夫人们行走于权门势家，还毫无羞涩之意。现在该禁止文武两班的妇女与除父母、亲兄弟姊妹、亲伯叔舅姨等以外的人员往来，以正风俗。

第四，中国的夏、殷、周以后，儒教的道未能发扬广大。至秦始皇焚烧经典之后，人心变得更加蒙昧，汉明帝时佛教传入。君主与其思慕佛教的清静寡欲，不如效法先王的恭默无为；与其以佛教的慈悲不杀为榜样，不如思考先王的克宽克仁和好生之德；与其畏惧佛教的报应之说，

⁸ 参照：《论语》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不如把赏善罚恶、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立为规范。这样一来，不但百姓受恩惠，天地、鬼神也会相助。

第五，身体力行勤俭是致治之本。命有司负责仓库的钱谷，算清一年出纳的数量，节约用度，因本国不产金银，应禁止其胡乱使用。

第六，宦官（中官、阉竖）的职责是守门、清扫，君主应选勤俭幼弱者，将其分为两组，一组十五人，吩咐守门、清扫，老奸巨滑者则全部逐出，使之不能接近。

第七，近君子远小人是人主之至德。君子在身边，仁义之说和道德之论常常入耳，渐渐受到熏陶，就能逐渐成为圣君；小人在身边，卑辞甘言的请托随时会有，奸诈的阴谋随时会得逞，君主会日益受到蒙蔽。无论古今，这都是治乱、兴亡的关键，君主必须天天与贤者见面，讲论治道，远离女人和宦官。

第八，初期宫中负责杂役的人员有定编，而到高丽末期，人员数没有限制，经费支出很多，这一弊端却未得到纠正。现在，该确定各宫负责杂役的人员数，把不必要的人员遣返回乡务农，以节约经费。

第九，鬼神之道就是福善祸淫，如不修德，不严谨地奉行祭祀，就会有害。古时候，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山川，大夫奉行五祀（房门、厨房、中溜、大门、大路），士人和庶人祭祀祖先和父母。这说明，各自向适当的地方行祭，但并不意味着不做善事、只奉鬼神就能得福。现在，应该禁止不合祭礼的所有淫祀，违反者应严厉处治。

第十，内帑的出纳曾有制度，如有内用，由内谒把国王的命令传给承旨，承旨再上奏国王，写王牌下令。但到高丽末期，内谒直接传下王牌，承旨却不知情，怎会无蒙骗之弊？现在关于这方面，应该由承旨直接禀议，向都评议使司下令，以革除前朝之弊。

第十一，军士方面握兵和发兵各司其职，这是古制。近来，各道节制使直接照会州、郡、县，抽调其水军、陆军及其它各种杂役人员到汉城，万一倭寇突然来犯，何人能够拦阻？现在应许可各道的节制使向都评议使司报告，得到国王的许可后再发送公文，征发一定的人员，禁止一切直接照会抽调的行为，违反者由本府予以弹劾、处理。

以上按照条目考察了可称为李原政治思想重要核心的《十条疏》和《十一条疏》的内容，现简单介绍除这两篇疏外的其它资料。⁹

首先介绍15篇疏，分别是《请幸行时扈从备礼疏》（1392年）、《请奴婢属公疏》（1392年）、《请废置奄宦曹恂疏》（1398年）、《请定衣章疏》

⁹ 参照：李东奎译，上述书，pp.318-319，329-365。

(1398年)、〈请斩曹恂疏〉(1398年)、〈请罢检校疏〉(1401年)、〈请立东宫置师傅疏〉(1401年)、[请禁奴婢争讼疏](1401年)、〈请谷山君延嗣宗旌表疏〉(1414年)、〈请罪李叔蕃疏〉(1416年)、〈请罢寺社奴婢疏〉(1419年)、〈请收张湛职牒录券及土田奴婢疏〉(1422年)、〈请罪权希达等疏〉(1424年)、〈因旱辞职疏〉(1425年)、〈请置左右史疏〉(1425年)等。

李原所上的启如下：〈请禁外戚婚姻启〉(1415年)、〈请减侍从暂行讲武启〉(1416年)、〈请备倭宗贞茂启〉(1417年)、〈军务事宜启〉(1418年)、〈请停对马岛启〉(1419年)、〈请上太上王徽号启〉(1421年)、〈请分给麦种启〉(1422年)、〈请卒哭后进肉膳启〉(1422年)、接着以上的启后上的〈再启〉(1422年)、〈请置让宁大君清州启〉(1423年)、〈请勿移置让宁大君清州启〉(1424年)、接着上的〈再启〉(1424年)、〈请寺社土田分属启〉(1424年)。

此外，李原上奏的笺有〈上太上王徽号贺笺〉(1421年)、〈上主上殿下贺笺〉(1421年)，还有〈江原道置助战金节使议〉(1417年)、〈犯罪蒙宥后科田给议〉(1418年)、〈钦问起居事议〉(1422年)、〈国葬发軔时耆老生徒奉辞议〉(1422年)、〈庆源、镜城防卫及筑城议〉(1426年)等献议。

以上通过介绍李原的〈十条疏〉、〈十一条疏〉、启、笺、献议，我们大致了解了其政治思想，并发现了其中的儒家哲学原理。下面将这些儒家哲学原理分为天命思想、王道思想、居敬戒慎思想、勤俭思想、排佛思想、禁止祈福淫祀及确立纪纲等几方面加以考察。

III、儒家的政治意识和李原的政治思想

1、天命思想

在〈十条疏〉开头，李原说“应天革命”时引用了《书经》周书召诰篇，解释说李太祖顺应天命，成为天的元子，改变了高丽的命运，创立朝鲜。这种应天革命与中国灭殷立周的武王(发)之应天革命相同。所谓天命，是说治理国家的君主如果无德，不爱民，天就会放逐他，立新的人物为君，其重要意义即在此。天命思想不但见于中国的《书经》、《诗经》等许多经典，经中世到近世一直产生了很大影响。

2、王道思想

《十条疏》开头引用了《书经》的“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强惟恤”，讨伐暴君创建新王朝的开国君主必须承担救黎民于水火的重任，所以如果开国君主不能拯救陷入塗炭的百姓，就是抗逆天命，应该再由新的开国君主来讨伐。因此，行王道就是行仁政，《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穀不可胜食也…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谈到“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而且，孟子将王者和霸者作了区分，用力量行仁政者是霸者，用德行仁政者是王者。汤是在不足七十里、文王是在不足百里的小地方施行仁政的王者。《孟子》公孙丑上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道不是在辽阔的国土上靠力量来施行，而不管国土大小，靠德得以施行。

王道思想是德治思想、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十条疏》的纳谏诤(第4条)、杜谗言(第5条)、亲君子(第3条)、信义(末尾)和《十一条疏》的近君子(第7条)、《请分给麦种启》(1422年)等都很好地表现出李原的王道思想。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君子、远小人，小人无论位于多重要的位置，都会首先考虑自己的私利，所以即使君主犯错，也不直言，反而在君主犯错之前加以诱导。孟子指出长君之恶与逢君之恶，今天仍然意味深长。¹⁰

3、居敬、戒慎思想

《论语》雍也篇说“居敬而行简”，孔子称颂雍(仲弓)说“可使南面”。听了他的话，雍不胜惶恐，问“子桑伯子如何？”，听到了“简”的评价，得出了“居敬而行简”的结论。¹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相比居敬行敬或居简行简，孔子认为居敬行简更是可以面南(成为君主)的人品。

李原在《十条疏》开头强调“…呜呼，曷其奈何不敬”，“夫敬者，

¹⁰ 《孟子》告子下：“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在这里，孟子指出，不能纠正君主错误之罪(长君之恶)很大，但在君主犯错之前把君意导向错误方面的罪(逢君之恶)更大。

¹¹ 参照：《论语》雍也篇，“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关于敬，《孟子》说“陈善闭邪谓之敬”，程颐的语录中说“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

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故大而事天飨帝，微而起居食息，不可得以离也”，解释说汤王和武王就是因为有居敬之心，所以取得了成功，桀王、纣王因为违反了居敬的原则，因而灭亡。《十条疏》的第6条引用《书经》，警戒逸欲，也表现出同样的居敬思想。

4、节俭思想

《论语》述而篇中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说明礼的本质与奢侈无关，而且禹和舜因为俭朴而受到尊敬。¹²

特别是君主如果不节俭，卿大夫等高级官僚就会追随，在他们的影响下，下级官僚和百姓也受到波及，所以君主比任何人都应该生活节俭。桀王和纣王都以奢侈浪费为能事，住高台广室，造出酒池肉林等，最终失去了国家。从这样的往事来看，节俭可谓使君主得国或失国的关键。李原在《十条疏》中强调崇尚节俭(第7条)，在《十一条疏》中列举躬行勤俭(第5条)、改善内帑出纳制(第10条)、缩减宫中工作人员(第8条)等，都强调了节俭思想。

5、排佛思想

排斥佛教的思想是朝鲜王朝初期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时期，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很自然的接受了被称为新儒学的性理学。¹³

经高丽王朝的安珦、白颐正，到李穡，性理学扎下根来，由此成长起来的丽末鲜初性理学者分为两大派：对把佛教作国教的高丽王室表现

¹² 此外，参照：《论语》泰伯篇说，“…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后汉书》边让传说，“思夏禹之卑宫，慕有虞之土阶”等。中国很早提倡崇俭的代表性思想家墨子，他的节用论深深地溶入中国人的生活，成为普遍的生活规范。

¹³ 孔子批判了似是而非，孟子强烈批判了杨朱的为我主义和墨翟的兼爱主义。为我主义是拔腿之一毛可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思想，兼爱主义是为朋友如为自己，为朋友的父母如为自己的父母，与儒家方法上的差别主义(从自己的父母推及他人父母的方法)不同。儒家思想是不断批评现实、与现实密切相关地发展而来的哲学和学问。参照：池教宪，《东洋哲学与韩国思想》，汉城，民俗苑，1995，pp.47-52。

抵抗倾向的势力和拥护高丽王朝的势力。李穡门下培养出来的郑道传是前者的代表人物，郑梦周是后者的代表人物。此时李原已经师从权近，权近站在与郑道传相同的学术立场上，一面批判佛教，一面研究郑道传的《佛氏杂辨》¹⁴，并加了注释。在这种氛围里，李原怀着排佛思想开始在朝鲜王朝的官僚生活是理所当然的。

他在《十条疏》里主张淘汰僧尼(第9条)，在《十一条疏》中提出要警惕佛教(第4条)，还上过请罢寺刹奴婢的疏(1419)和请分寺刹田土的启(1424)。

6、祈福、淫祀的禁断

祭祀的对象非常多样广泛，但一般来说，问题是被称为鬼神的祭祀对象是真鬼神，还是假鬼神，是不是祭祀者应该祭祀的鬼神。¹⁵

李原认为，古时候天子和诸侯、大夫、士人和庶人各自祭祀的对象是有规定的，他只承认符合当时祭礼的祭祀，其余都规定为淫祀，主张全部禁绝。这里重要的是，他认为取缔淫祀可以取得节约时间和财物的效果，而且还称鬼神之道是福善祸淫。根据这种信念和价值判断，在《十一条疏》第9条中，他主张只承认国家承认的祭祀，禁止其余的淫祀，违反者应予以处罚。

7、纪纲的确立

纪纲是引导、支撑国家和社会前进的关键、根本、法度和精神基准，所谓纪纲，根据不同情况用作好几种意思，多指包括人伦道德或法、规则的所有国家社会规范。¹⁶ 纪纲在治理国家、社会的最根本的位置上发

¹⁴ 郑道传在《佛氏杂辨》中对佛教的轮回说、因果说、心性说等几条进行了论辩，《心气理》篇中列举佛家、道家和儒家的根本特点，批判了佛家和道家的矛盾，拥护儒家。

¹⁵ 《礼记》曲礼下说，“非其所祭而祭之，命曰淫祀，淫祀无福”（陈注）“淫祀皆是不正之鬼，假令正当正神，自可不所祀以祀，便是淫祀”（义疏）“…淫过也，以过事，神不享也，故无福…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在人则为谄，于礼为淫。”

¹⁶ 传统社会的规范有所谓三纲、五伦、四维、六纪等，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

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其它所有的政治功能可以说都是附着于纪纲上的功能，李原把纪纲列在〈十条疏〉第1条，意味着它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原所说的纪纲，只能被理解为应当为的要求产生的抽象概念，可是他在第2条提出了明赏罚，明赏罚是为了使赏罚公平，如同天地公平对待万物一样，君主的私心不能介入。李原曾上疏请求处罚无理的李叔蕃(1416年)，上疏请求回收参与芳干之乱(1400年)的张湛的职牒、录券及田土、奴婢(1422年)，并上疏请求处罚在作为使臣在去中国的路上作出无礼、粗暴行动的权希达和隐瞒权希达之罪不报的李从茂等以及听到却隐瞒不报的从事官赵玄璲等(1424年)，都是出于明赏罚的目的，是确立纪纲的具体方法。

此外，〈十条疏〉的斥宦官(第8条)和〈十一条疏〉的中官阉竖(第6条)、请求废置暗中收取银器、衣服和马匹的宦官赵恂的〈请废置奄宦曹恂疏〉(1398年)、〈请斩曹恂疏〉(1398年)，〈十条疏〉的严宫闱(第10条)、〈十一条疏〉的女子往来限制(第3条)及戎士严重(第11条)和西北面国境地区准备(第1条)、西北方面兵器确保(第2条)、〈江原道置助战金节使议〉(1417年)、〈庆源、镜城防卫及战城议〉(1426年)、请求旌表辞官尽孝的谷山君延嗣宗的〈请谷山君延嗣宗旌表疏〉(1414年)等，也都是为了确立国家和社会的纪纲。¹⁷

这里特别显扬延嗣宗的孝道，表明他认为孝道是美风良俗之根本的认识。乍看起来孝道似乎单纯属于家庭伦理，但分析其具体内容，就不得不承认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国家伦理紧密相连的事实，家庭伦理不正，社会伦理也难正，只从这一事实，就能悟到孝道的伦理功能有多么重要。¹⁸

纲、夫为妇纲，五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四维是礼、义、廉、耻，六纪是对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的道理。这种规范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动，或随着文化、理念的差异和进步表现出差异，这自不必言。例如，现在以专制君主体制或一夫多妻制为前提的规范不能不从根本上经历变革，在自由民主主义社会要形成这个社会要求的新规范。

¹⁷ 延嗣宗历任议政府参赞和中军都总制，被封为谷山府院君，人品关和、恭俭。父亲去世后，因作为儿子临终时未能守在前面深感伤心，辞去官职，尽心奉养老母。李原在〈请谷山君延嗣宗旌表疏〉中请求‘特令旌表闾门，以劝边俗’。参照：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2，太宗实录，太宗 卷二十八 十四年甲午十二月，p.47上，〈己卯 命旌表谷山君延嗣宗之闾〉条及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3，太宗实录，世宗 卷六十四 十六年甲寅五月，p.564上，〈谷山府院君 延嗣宗 卒〉条。

¹⁸ 关于孝思想，参照：池教宪，《韩国的孝思想》，汉城，民俗苑，1997，pp.40-44。

IV、李原政治思想之现代意义

关于容轩李原的记录在《高丽史》、《太祖实录》、《正宗实录》、《太宗实录》、《世宗实录》、《国朝人物考》、《大东韵玉》、《海东名臣言行录》等数种文献中可以找到，关于对李原的评价可以参考以下几份资料，其内容如下。¹⁹

《大东韵玉》说他“器重洪深，为相务从宽大，不喜更张，以诗名”，〈画像赞〉说他“壁立之气，正大之风，绘事后素，遐想其忠，大树谦德，不泯我东”，赞扬他绝壁般高耸的气概和正大的风度是绘事后素²⁰的基础，远大的想法和忠诚像大树²¹谦逊之德，永远不会泯灭。《海东名臣言行录》记录如下：十五岁进士科合格，十八岁登科，郑圃隐主试席曾惊叹不已。…公出入朝廷二十余年，任宰相九年，政务宽大，不喜更张，戒过度显扬，常求身退。有人猜忌公，追究所谓不明不白的过失，太宗为公洗清冤枉。²²太宗崩御后，猜忌公的人怂恿台谏陷公于死地，世宗看重台谏的观点不同，将公发配砺山，准备以后招回，复宰相之职。但猜忌者又横加拦阻。公病死于1429年。公面相宏大、出众，气概和度量宽广，平生不巧言对人，决定大事时安稳如山，施与占都不存私心，因此无人不满。公遭逢一次颠沛，未能帮世宗完成维新之治，不能不说是天地之命。金商雨的〈明溪书院讲堂上梁文〉说他“学术渊源，出入圃隐牧隐之堂奥”，阐明了李原学术的渊源。〈清道明溪书院奉安文〉说他“学有准的，盖由阳村”，说明李原继承了阳村的学问。〈明溪书院移奉时告由文〉中说他“经术匀衡，正大壁立，沉默渊渟”，学问和能力均衡，正大如绝壁直立，沉默如深水。李蕃秀的〈明湖书院讲堂上梁文〉中作了如下叙述：容轩先生…谈论道义，经营国家，在太祖和太宗朝辅助君主

¹⁹ 以下内容参照：李东奎，上述书 pp.376-404。

²⁰ 所谓绘事后素，指有白色的底色后才能在上面用各种颜色绘画，即人有美好的人品做基础才能做学问或成为官员。参照《论语》八佾篇。

²¹ 关于大树，有一个典故，说后汉一个叫冯异的将军非常谦逊，其他将军夸耀功劳时，自己就避到大树下去。

²² 李原为娶内隐达之女为妾，与洪汝方相争，曾遭到司宪府的弹劾，这里指此事。当时，李原任右议政世子师，洪汝方任顺承府尹，国王未准罢黜他们。参照：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2，太宗实录，太宗卷三十五，十八年戊戌六月，p.235上，〈乙未 司宪府上疏请右议政李原、顺承府洪汝方等罪〉

治理国家，在丞相之位上让广大百姓过上平安生活，人们赠送了匀衡之平的贺礼。…事功全以学问的纯正、深奥为基础，言论、文章都很出色。权相圭的《容轩先生文集后序》说，“在王氏统治国家五百年间，康献大王(太祖)以汤、武之德，不得不一时作为在下之贤汇征朝列，并自誓为伊尹、吕尚…对内历谏诤喉舌之职，朝廷纪纲得以整肃，对外担任字牧、旬宣(牧民官的职务和朝廷的职务)，治理、教化日益兴隆。…先生出入庙堂二十余年，责难于君、陈善闭邪、²³明王道之文中值得后代仿效者颇多。”

可以说，李原学问上的目标是权近，其渊源经权近可以上溯到郑道传和李穡，与郑梦周也在登科有座主、门生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李原修习学问，踏上仕途。如果把太宗比喻为汤王或武王一样的人物，李原可以说是自诩为帮助他们发动易姓革命、建设新王朝的伊尹或吕尚式的人物。按照这种说法，《容轩先生文集》后序中把太宗和李原比喻为开国之主和辅助开国君主的臣下或老师，可说也不是那么不恰当的比喻。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即文集的序、跋或画像赞、位牌奉安文、祝文等对主人公大加赞扬是普遍现象。他被称赞为一个兼具正直气概和正大风度的谦虚的文人，堪以学问和官职来文饰，据说太宗元年他被荐举为清官。²⁴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李原的学问和人品都很出众，仍受到某种嫌疑，遭到发配，因此未能辅助世宗的维新之治。李原最终没能帮世宗推行维新之治，1426年(世宗8年)3月被剥夺了功臣录券及职文牒，被安置在砺山，1429年(世宗11年)6月病死在发配之地。李原为何遭到发配，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换言之，撇开表面的理由不说，如果说有内部隐藏的理由，那到底是什么？这是个疑问。²⁵表面上的理由尽管记录在《世宗实录》上，《大东韵玉》和《海东名臣言行录》说了“不喜更张”一句，引起人们的注意。难道是在世宗朝推进的各种改革和紧急问题处理中

²³ ‘责难陈善之言’是谏诤君主施行爱民政治等善政，劝其行善，阻其行恶。

²⁴ 李裕崙，《李氏绎史》(铁城文库 第2集)，出版社不详，檀纪4293(1960)年，第37章，《四千年文献通考》。

²⁵ 关于李原遭发配的嫌疑，参照：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3，世宗实录，世宗 卷三十一 八年丙午三月，p.14下，〈司宪府启 左议政李原 自己家非少也〉条及p.15上，〈司宪持平成念祖启曰〉条。此外，关于李原的功臣录券返还，参照：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7，世祖实录，世祖 卷四 二年丙子七月，p.144下，〈命还给李原功臣录券〉条。

提出了与多数人不同的意见,因而被视为改革的反对者?令人无从得知。

研究者在第III章提出了李原政治思想的七条儒家哲学原理,天命思想是认为统治者可根据天命改换的思想,即敬畏天意的思想。它说,民心转达到天,天根据统治者的行为,既表现出休征,也表现出咎征。这种思想发展为天人感应说。在长期流传期间,其非科学性受到指摘,也遭到否定性批判。²⁶ 尽管如此,天命思想决定统治者行使权利时是否顺民意,因而支撑着儒家的民本思想。李原因干旱上的〈因旱辞职疏〉(1425年)中说“调元者,宰相之职…未能辅弼上德,变理阴阳,以致旱干。伏望停臣任职,以答天谴,国家幸甚”,申请辞职。但王把辞职书还给他,说“今当大旱,卿之辞职,固然矣…”,这些观点是天人感应说的典型,因此,只要发生自然灾害,统治者的德首先受到怀疑,如果是风调雨顺之年,统治者的德就倍受信赖。

王道思想要求成为爱护、照顾百姓如对赤子的圣人君主,因此,必须超越消极的水准,积极努力于利用厚生。今天,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和领导人都争先推进福利政策,与儒家很早就强调正德、利用厚生一脉相通。²⁷

居敬、戒慎思想是通过敬达到警戒、谨慎的思想,在传统社会,君主比任何人都享有强有力的权力和富裕的物质,因而很容易变得傲慢、放荡、忘却本分,如果不居敬、戒慎就很难实现王道。居敬和戒慎是敬畏百姓、敬畏良心、珍视大树将军(不夸耀自己功劳的后汉将军冯异)那种谦逊态度的思想。

勤俭思想在儒家哲学伦理中占据很重要的分额,勤俭不单指节约拥有的物品,还意味着勤劳工作,努力生产。《大学》传10章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说明它也是完全符合经济原理的哲学,资本主义社会的格言说消费是美德,但绝不是说浪费是美德。

²⁶ 《书经》周书 洪范篇中有‘念用庶征’一句,是指根据统治者的德性,天表示出休征,也表示咎征,要人们时刻铭记。这种思想表现为天人感应思想,汉朝的董仲舒是其代表人物,比董仲舒晚六十年左右出生的王充批判天人感应说毫无根据,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然而,在中国社会,道德和政治被认为不可分割,那种认为统治者有德自然现象就随顺、一切都随顺的思想长期存在。

²⁷ 《尚书》大禹谟说,“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里的正德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从、正百姓之德,利用是制造各种机具,流通财货,以利民之用度,厚生指用衣食使百姓免除寒冷和饥饿,使他们的生活丰厚。

李原在〈十条疏〉里强调的节俭是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我们严酷的现实切实需要的国民经济哲学，特别第7条说“凡所施为，毋使纵侈，则下民观感，而亦归于厚矣”，我们应该虚心倾听。经济上正义的实现取决于政府和领导阶层，经济上的正义形成政治上的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根本。

佛教的重要核心是慈悲、不作恶、行善，但是在丽末鲜初，佛教界呈现出与其本质相去甚远的没落现象，僧侣们入山修道，不但与所谓生财大道相左，而且佛教教理中有否定人的实际存在和国家社会现实的方面，这大概使之看起来成为妨碍拯救百姓于水火、树立民族正气的障碍。在作为新知识阶级出现的儒学者眼中看来，支配高丽社会的佛教可能是应该革新的旧时代遗物，甚至是应该排斥的东西。其实不只是佛教，我国所有的宗教都不能离开我们生动的现实，哪怕仅仅是一步。

淫祀指祭祀的对象不符合行祭人的身份，李原主张必须禁绝的根据是并非祭祀鬼神就得到赐福，不祭祀，就得不到赐福，而是福只会赐予善人，对恶人则降祸。所谓福善祸淫，意味着鬼神总站在正义的一边，但更重要的是，它暗示不播种就没有收获这一朴素的因果法则。因果法则和科学认识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是包括政治科学在内的一切哲学的基础。

无论维护家庭、社会还是国家，纪纲的确立都是最亟需解决的课题，特别对于国政，李原指出，相关论议不在公共场所公开进行，却由宦官或王室亲、姻、戚出入宫殿时通过暗中交谈来左右是不对的。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李原特别显扬延嗣宗的孝行一事，确实如他所说，孝行是百行之源，所有伦理的出发点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孝道的原理扩大、发展为社会和国家，在这一点上，孝道确实是确立纪纲的关键。

综上所述，容轩李原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家哲学原理为基础的、为解决当代国家和社会面临的课题所切实需要的思想。